

網路潛水者的公民參與實踐之探索： 以「野草莓運動」為例^{*}

李明穎^{**}

投稿日期：100 年 12 月 11 日；通過日期：101 年 5 月 8 日。

^{*}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網路潛水者的公民參與實踐之探索：以「野草莓運動」為例》（NSC 98-2410-H-126-039）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研究過程中所有受訪者，與研究助理許純鳳、洪鈺婷的協助，以及期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 作者李明穎為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 miyilee2010@gmail.com。

《摘要》

網路是社會運動行動者的資源動員的新利器，但參與落差會限制網路社會運動的潛能。本研究從網路潛水者的角度切入，以「野草莓運動」為個案，藉由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分析，勾勒出潛水者參與社會運動的樣貌，思索其實踐公民參與的潛能或限制。本研究發現，社會運動行動者誇大了網路工具理性，而忽略潛水者對運動的疏離感。潛水者拒絕被歸屬於特定族群，更不想因為現身而被標籤化，伴隨網路技術而來的失望，深化他們對運動的他者心態。

關鍵詞：公民參與、社會運動、野草莓運動、網路、潛水者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ies, ICTs）的發展與盛行，不只改善傳統代議政治中為人垢病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問題，也大幅增進公民參與的潛能，引起了關於「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的諸多討論（Budge, 1996; Grossman, 1995），似乎為 1990 年代以降西方民主國家普遍面臨青年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低落的困境（Norris, 2002; Putnam, 2000; Verba, Scholzman, & Brady, 1995），帶來一絲「挽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的曙光。

對向來資源貧乏的社會運動行動者（activists）來說，網路是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的利器。網路低成本、快速傳遞等特性，有利於資訊產出、散佈與回應等傳播功能（Salter, 2003, p. 128），除了可以快速推廣反對理念（protest ideas），也可以進行策略性的傳布（Norris, 2002, p. 208），發揮了以往傳統大眾媒體所不及的成效。愈來愈多跳脫傳統制式思維的網路民主游擊戰在全球蔓延開來。從 1994 年墨西哥薩帕塔（Zapatistas）游擊隊反軍事鎮壓訴求獲得全球輿論聲援，成為資訊時代中「第一個資訊游擊戰的運動」（Castells, 2004, p. 82）以來，1999 年西雅圖的「反全球化」行動到去年於北非和中東等地的「茉莉花」民主運動，以及國內前幾年的反樂生拆遷、野草莓運動到近期的反國光石化運動等國內外經驗，都可見到以青年為行動主體，大量運用網路從事社會運動蹤跡。

尤其發生在 2008 年 11 月發生的野草莓運動，是國內近年來一場由網路科技串連而起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以大學生、研究生為主體（陳順孝，2008 年 11 月 26 日），他們大量運用即時通訊軟體、PTT、微網誌、部落格、串聯貼紙、共享書籤等網路技術來創造議題，並進行組織

動員與發聲，更破天荒地使用網路現場轉播，跨區域地即時傳布訊息，成爲一場揉合高科技、青年等原素的社會運動，而現場參與者也採用審議民主方式，公開討論決定運動的議題與走向，「開啓了台灣學運的新紀元」（陶儀芬，2008 年 11 月 11 日），也改變了台灣社會普遍對年輕世代一壓就碎的「草莓族」，以及不關心社會事務自掃門前雪的自我中心的印象（周祝瑛，2008 年 11 月 13 日）。

網路成爲社會運動行動者運用的新式傳播資源，成爲穿越資訊權力控制與自由越界的抗爭場域（Melucci, 1996）。不論用於對內聯繫溝通，或發展對外發聲的媒體策略，協助動員與組織抗議遊行活動（Warkentin, 2001），網路成爲實體社會運動的延伸戰場，或是反攻實體世界中主流媒體的主戰場。這種視網路爲優勢的工具論，將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內化成是種社會運動的參與過程，不過卻未能細緻地探索社會運動參與經驗的內部豐富性與外部複雜性。

社會脈絡的差異性影響了社會運動與網路所呈顯的力道與議題方向。網路受到既有社會脈絡的型塑，也可能型塑出新的社會差異，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是社會差異、網路技術和社會運動三者相互作用的複雜效果（林鶴玲、鄭陸霖，2001，頁 114）。無論科技近用、社會近用（Kling, 1996），或人口變項等因素（Rogers, 2001），都可能造成全球落差（global divide）與社會落差（social divide），而不同民眾利用網路涉入、參與或組織動員也產生「民主落差」（democratic divide）（Norris, 2001），這些參與落差都可能限制民眾使用網路參與社會運動的開放性與普及性，以致影響力僅只於特定群體。

在網路使用者中，有一群爲數眾多但相對被動、甚至是趨近於沈默的潛水者（lurker），幾乎佔了網路使用者的多數，至少高達九成以上（Katz, 1998; Nieleison, 2006; Preece, Nonnecke, & Andrews, 2004）。相較於少數積極、活躍的網路使用者，潛水者因爲沒有明顯地公開表達意見，幾乎是被動、傾聽、觀看的旁觀者角色，他們成了最不可捉摸的族

群。現行大多數的社會運動研究，都關注在社會運動的主體的行動者身上。隨者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漸成趨勢，而網路潛水（lurking）又是早為人知的普遍現象，卻鮮少有研究正視潛水者這個族群參與社會運動的意義。網路潛水在社會運動中會不會是一種被忽略的公民參與？如果少數的社會運動行動者掌握網路發聲工具，但是其他多數的潛水者都默不作聲的話，那麼網路社會運動能夠發揮的影響力為何？

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中不只是可見的行動者，還包含了不易見的潛水者，如果存而不論他們，除了簡化了參與者之間的行動差異，也將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經驗化約成行動者的「絕對」詮釋。不同的社會運動性質、不同的訴求對象都會影響到潛在群眾的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社會運動拓展功能（林鶴玲、鄭陸霖，2001，頁 123）。目前國內外從事網路潛水者相關研究並不多，國外僅少數研究曾經探討過潛水者在自由軟體推廣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Spaeth, Haeffliger, von Krogh, & Renzl, 2008; von Krogh, Spaeth, & Lakhani, 2003），而國內從潛水者參與觀點切入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相關實證研究，幾乎是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旨在勾勒出網路潛水者參與社會運動的樣貌，以「野草莓運動」為例，從潛水者參與行動者的網路發聲與動員經驗中，思索潛水者在實踐公民參與的潛能或限制。

貳、文獻探討

社會運動是「持續行動的集合體，以促進或阻止社會的改變」（Turner & Killian, 1987, p. 390），結合了共同目的、團結與持續性等元素的集體行動，然而網路本身卻對社會運動的定義產生根本的挑戰（林鶴玲、鄭陸霖，2001，頁 115），儘管網路潛水是一般人琅琅上口的網路使用行為，但潛水者的面貌卻是模糊難辨，本研究先就國內外相關研究，初步辨識出潛水者形貌，接著從社會運動相關文獻中，梳理出

集體行動的搭便車困境與可能解決之道，但網路潛水者的參與特性卻對社會運動的集體性格產生了更多的挑戰。

一、「看見」潛水者

國外研究定義潛水者大致可分成兩種：一種是只瀏覽但一篇文章都不張貼，不做訊息交換、屬於完全不發言的網路使用者（Burnett, 2000; Katz, 1998）；另一種則是在一段時期內，發言次數極少（含張貼文章），互動訊息量較少、大部份時間是在瀏覽資訊的網路使用者（Kollock & Smith, 1996; Nonnecke, 2000; Zhang & Storck, 2001）。

在早期著名網路社群 WELL 中，Smith（1992）發現，該社群中的固定成員幾乎張貼了所有文章總數的 50%，而這些固定成員卻只佔了整體成員比例的 1%，而 Katz（1998）直指高達九成以上都是不發言的潛水者。Nonnecke（2000）發現，高達 55% 的社群成員在三個月內都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文章，而 Zhang 與 Storck（2001）則以六週期間為標準，發現個人發表的文章數量不到 30 篇，佔了社群成員的 92.68%。Nielsen（2006）還提出了一個「90-9-1」法則，指出網路使用者中有 90% 是完全不貢獻的潛水者，9% 是偶而出聲的間歇性貢獻者（intermittent contributors），但其他活動仍佔據他們大部份的時間，而只有 1% 是經常發言的重度貢獻者（heavy contributors）。

如果只從發言與否來定義潛水者，只是窄化了網路社群成員參與網路活動的多樣性。網路社群植基於一般觀念的「社區」，成員擁有共同的信念與價值觀、彼此間不斷地交換訊息、共享決策參與權、凝聚力等特性（吳筱玫，2003，頁 171）。依照 Nonneck（2000, p. 81）的說法，潛水既是一種近用（access）社群的方式，也是一種參與方式。潛水者並非不近用社群，而是以一種遠距、非公開的隱匿行蹤的方式，持續參與社群活動。潛水者如何與社群內其他成員進行互動，尋找對社群的

「認同存在感」，才是他們潛水的行動誘因（incentives）。

網路潛水者之所以潛水，大部份原因取決於他們與社群他人互動的關係。Correll（1995）發現，潛水是新手參與社群的必經歷程。新手在進入一個社群的初期，鑑於對既有環境的不熟悉，而需要在旁邊觀看，學習適應社群文化，因此潛水者只是初期融入困難，一旦他們對社群環境熟悉後，他們的參與行為模式就不限於潛水。Preece 等人（2004）發現，他們之所以潛水，包括沒有需求、需要認識社群、無法對社群作出貢獻、糟糕的電腦使用能力、無法融入社群等五項主要原因。

網路潛水者的個人心理動機、參與環境的熟悉度，甚至是個人發言的使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他們更在意的是能夠建立自我價值，以獲得社群的認同。網路潛水者之所以沈默，源於非常在意他人的反應，他們可能對討論的議題，沒有信心能夠給出好的論述，擔心不恰當的論述會招致批評（Preece et al., 2004, pp. 210-215），甚至害怕引起戰火（flaming），進而影響他們在融入社群時的困難度。不論網路潛水的原因為何，潛水者並非完全不在意社群的動靜，他們反而會相當在意自己與社群他人的互動，以及對社群產生的貢獻度。

就算網路潛水者選擇純瀏覽而不公開發表，Katz（1998）認為他們仍會透過其他管道，進行私下的溝通。Lindlof 與 Shatzer（1998）更發現，潛水者這種不公開表述行為，反而讓公開發言者產生了心理不確定的不安全感，利用監視的壓力減損其發言貢獻的潛力。網路潛水者對社群的貢獻度並沒有減少，反而因為對社群中激進的行動者產生心理壓力，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制衡。他們只取（take）而不給（give）的行為模式，並非只是單純採取旁觀者（outsider）的姿態，或許更具有謀定而後動的策略意味。

國內外大部份研究都從潛水者對網路社群的知識貢獻度，肯定其參與的正面意義。Zhang 與 Storck（2001）指出，與積極活躍的使用者相較，偶而發聲的潛水者促成知識交換的貢獻度不遑多讓，只不過在於內

容方向的差異。潛水者是種「周邊參與者」，李郁薇（2005）以國內學習社群為例，她認為儘管潛水者在社群中體驗到的是疏離感，維持周邊位置的觀察，但是他們會對社群具有強烈認同感。尤其當潛水者持續性地關注，或許是一種極具策略性且活躍的參與行為。李郁薇、陳斐卿與江火明（2006）進一步進出，潛水者企圖在未能局勢下轉化自己可能的處境，並揣度出自己所能給出的貢獻，這是他們的協商心思。因此，儘管網路潛水者是一種處於邊緣位置「非公開的參與」（non-public participation），起碼他們對該社群保有一定的興趣，他們仍然共享社群認同、社群資源與投入感，潛水行為是可以具有利他（altruistic）傾向（Nonnecke & Preece, 2001）。

以自由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推廣為例，von Krogh 等人（2003）發現潛水者是極具潛力的新發展族群，因為他們不只閱讀資訊，還會嘗試使用自由軟體並散布名聲，甚至不少的發展者（developers）都曾經潛水過一陣子，大大促進自由軟體的知識共享與流通。Spaeth 等人（2008）曾經檢視不同程度的參與者涉入自由軟體計畫的公共資源（communal resources）的集體行動，指出儘管潛水者在名聲、科技控制，以及學習機會等公共資源，遠遠不及貢獻者（contributors）與開發者（developers），但他們仍會近用這些資源，從未成就個人化目的。因此，只要近用公共資源機會增加，潛水者參與促進社會共善的程度也會增加。

然而，潛水者隱匿行蹤的參與方式，因為不容易被人公開察覺，甚至因為靜默的參與方式，常常被排除在社群成員之外。在刻板印象中，潛水者因為被動、害怕公開表達意見，轉而選擇瀏覽資訊，總是被視為一種消極的參與行為，也顯示出他們對社群的疏離感。因此，在社群講究合作或分享的前提下，潛水隱匿不僅不被鼓勵，還被批評為「搭便車」（free-ride）的自私行為，甚至潛水者也被視為社群中的次等份子（Preece et al., 2004, p. 203; Smith & Kollock, 1999）。過去研究潛水者

是否產生搭便車行為時，社群疆界通常明顯、參與對象明確，而且社群旨趣偏向知識分享。如果網路社群疆界不明顯，並非由單一社群組成，而是由不同社群或個人聚集所產生的集體行動，那麼潛水者是否也會趁機搭便車？

二、集體行動的困境與解決

從社群共同體的概念所開展的社會運動，強調的是維護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爲了區隔散漫隨機的集體行動，以及容納不同特性的新社會運動與網路運動形式，社會運動是「在既有社會秩序下的弱勢者，透過集體的力量，企圖發展比較合理秩序的想像，並集體地抵抗、抵制，或改變既有體制的過程」（林鶴玲、鄭陸霖，2001，頁 116）。

社會運動相當重視集體行動，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不過，理性、自利的個人並不會爲了共同或團體利益而採取行動，因此在參與成本、理性、利益、團體規模等考量下，很容易產生搭便車的集體行動困境（Olson, 1965），除了個人不想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也會設想他人搭便車心態而拒絕參與，導致公共利益難以找到支持者。儘管如此，Olson 提出在一些沒有組織代表的潛在團體（latent group），可以透過強制入會與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的方式，將參與成本轉化爲義務，並提供貢獻者參與所能獨享的好處，如此可解決搭便車的困境。

不同於 Olson 的見解，部份學者（Muller & Opp, 1986; Oliver, 1984）則認爲，對某些積極參與者而言，追求公共利益是比較重要的誘因，相當程度影響了參與社會抗議的個人計算，搭便車不但不是集體行動的障礙，反而會激化出他們強烈的參與意志。透過社會運動的網絡，不只能協助個人的「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理解改變現狀的可能（McAdam, 1999），還能提供「團結誘因」（solidarity

incentive），把自己的集體參與當作實際的報酬，公共參與反而成了一種樂趣，而不是一種承受的代價（Hirschman, 2002）。

社會運動的能量強化，需要創造更多機會，持續不斷地向民眾說服理念與傳達訴求，召喚他們進入集體認同的建立過程。集體認同並不是靜止不動，而是「一種集合體變成集合體的過程」（Melucci, 1995, p. 43），包括我群意識的建立、共享政治意識、目標、關係網絡、運動環境等（Nip, 2004, p. 236）。社會運動藉由網絡內的關係聯繫，個人才會體認到共同的處境，進一步提高集體動員行動的可能性。Friedman 與 McAdam（1992, p. 163）主張，社會運動可以依賴事先存在的人際網絡或既有組織，佔用他們的集體認同，就容易克服搭便車的問題。

網路做為社會運動行動者的資源動員的新工具，除了節省資源與成本外，也使得動員行動得以擴大化與多樣化，甚至出現傳統示威遊行的部份替代效果，提供了參與者很多的行動誘因。當社會運動上網後，網路世界也構成了另一個參與「現場」，而非網下現實的媒體「再現」。因應個人實際參與時的需求差異，網路的溝通彈性（例如，時間、地點）有利參與者發展出替代性的虛擬社區和人際網絡，得以凝聚成具有行動力的社群（Mele, 1999）。網路在允許社會運動的潛在支持者無需接觸其他成員的情況下，仍然能維持對組織及活動的參與度，有助於成員對議題認同的連結（McAdam & Paulsen, 1997）。

不過，一旦實體社會運動的訴求對象、溝通情境與動員結構，碰上網路技術所塑造出的虛擬空間時，未必都是浪漫的想像。由於網路鬆散的資訊流通與結構組織，又少了運動現場的創造，再加上網路的匿名性，往往擴大了搭便車的動員陷阱，而有癱瘓集體行動的可能，掩飾了實際運動的停滯不前與自我麻痺（鄭陸霖、林鶴玲，2001，頁 64）。

網路提供多元且便利的公共參與管道，但是參與者是原來就對政治興趣較高、資訊尋求動機較強、政治效能感高的特定群眾，而且網路使用會造成人際疏離，並降低傳統團體組織對於政治運作的正面影響。因

此，網路使用會加深政治資源取得的鴻溝（Jennings & Zeitner, 2003）。以國內情形而言，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發現，會去造訪社運團體網站者，仍是現有的網路使用者，而非線下社會中關懷社會運動的支持者。如果社會運動行動者欲利用網路壯大運動資源，主要限制可能會來自於同質性過高的網路使用者。

社會運動行動者固然可以利用網路掌握更多自主詮釋的發聲機會，但是公開表達意見、進行動員畢竟只是少數人的「權力遊戲」工具而已。當大多數網路潛水者選擇沈默，只是成為少數菁英意見的宰制對象，形成一種相對少數剝奪相對多數的奇特現象。蔡鴻濱（2006）從苦勞網中「反香港 WTO」事件中發現，使用網路參與社會運動的主要是弱勢族群使用者中的相對強勢族群，使得議題訴求受限於菁英觀點。李明穎（2008）從反對樂生療養院遷移事件中發現，少數活躍份子傾向尋求菁英份子的「共識」，刻意利用網路傳達與積極表示意見，壓抑大多數沈默的聲音，造成一種由少數菁英份子主導輿論的景象。

傳統社會運動強調參與者彼此親身接觸溝通以及現實空間聚集，對於召喚群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van de Donk, Loader, Nixon, & Rucht, 2004, p. 9）。網路潛水者既不公開表達意見也鮮少與人互動，降低了參與者彼此之間的團結誘因。網路固然有利於動員訊息的快速傳遞，面對面親身接觸互動、溝通與說服，不易為遠距離的單純閱讀瀏覽所取代，網路容易造成疏離感，影響了社群的凝聚感。社會運動是人群組織化的過程，網路使得組織性不滿很容易集結，但是它所能提供的溝通情境無法產生社會團結，因為沒有面對面互動所產生的情感投入而少了集體認同（何明修，2005，頁 113）。

傳統社會運動需要實體空間展現大規模群眾動員能量，藉此對權力中心施壓。網路上發聲、串連、造勢、動員為數眾多，網路下的真正抗爭活動才是社會運動的重頭戲（林鶴玲、鄭陸霖，2001，頁 147）。儘管社會運動在網路上討論得沸沸揚揚，卻可能面臨「上網容易下網難」

的困境，尤其網路潛水者會否現身參與線下抗爭更值得存疑，因此線下動員效果不宜被過度高估。

濃密的社會網絡有助於集體行動的參與，社會運動可以依循既有的網絡，以滾雪球接力方式，形成廣大動員，而搭便車的困境也可以從中獲得解決（Friedman & McAdam, 1992）。網路只是社會運動的動員工具，實際上，線上動員更需要透過線下組織與關係網絡的連結，甚至涉及社會資產（social capital）所強調的人際的信任與社群的參與（Putnam, 2000）。網路使用造成人際疏離的結果，和人際信任與社區公民參與都有關係，網路使用、政治參與及社會資產會因個人使用情境與使用動機而有所不同（張卿卿，2006）。儘管社會運動行動者透過網路可能號召到對運動議題關心的同質性網路潛水者，但是動員規模與效果，還需考量潛水者的線上使用情境、彼此間背後的關係網絡，甚至線下參與公共事務的生活脈絡等。

社會運動的訴求對象不同，產生的效果與意義也不同。誠如資深社會運動工作者簡錫堦指出，「網路具備極強的分眾能力，如果能確實掌握社群、擴大行動連結，網路確實讓運動者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黃哲斌、何榮幸、高有智、郭石城，2008 年 11 月 21 日）。如果行動者想要納入潛在支持的潛水者，以擴大群眾動員能量，勢必要考量潛水者特有的溝通情境與行動特性，重新調整運動策略與操作方式。

三、小結

綜合前述文獻發現，儘管網路孕育公民參與的新契機，社會運動行動者掌握加速意見表達與動員機會（Norris, 2002, p. 211），但是網路上意見控制、溝通情境疏離感、線上線下動員行動轉換等問題，仍然擺脫不掉潛水者可能搭便車的陰影。社會運動從傳布消息、聯繫合作到組織動員，就是在進行說服大眾的過程，需要建構出足以召喚社會共識的民

意基礎。社會運動是由一群人所發動的集體行動，Myers（1994）主張，社會運動要能夠使更多局外人、旁觀者產生心理認同，才能進而維持運動的正當性，並提升社會大眾對議題的意識與支持。本研究提出了二個主要研究問題：

1. 野草莓運動行動者如何運用網路傳遞資訊、溝通以及動員？
2. 網路潛水者如何回應上述網路社運行動？網路潛水者的參與是否再現「搭便車」現象？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執行

野草莓運動經由網路串連而起，網路成為行動者進行對外發聲或對內下達動員消息的管道。Downing（2001, p. 34）指出，社會運動行動者利用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做為自己非主流論述的發聲場域，在這個場域中所允許的內部對話，通常會牽涉到行動者、旁觀者彼此間意義建構的分享過程，協助他們對問題和策略達成共識。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以野草莓運動中的網路潛水者做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度訪談其參與經驗，佐以深度訪談行動者在網路發聲與動員的操作經驗，並就相關媒體報導進行次級資料分析，藉此了解行動者、潛水者彼此間如何詮釋並反思自身的公民參與的意義。

做為初探式網路潛水者參與社會運動研究，本研究不採取過去潛水者相關研究慣以發言與否做為潛水者的「絕對」定義，而是改以積極／消極、主動／被動的「相對」參與概念，將參與社會運動的網路潛水者定位為網路旁觀者，對比積極參與的行動者。因應網路而起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並不限於單一網路討論區，甚至他們的參與行動都是多樣且複雜，因此本研究並不依賴參與者的自我報告（self-report）做為定義標

準，而改採自行設計的操作定義。過去相關研究在定義網路潛水者時，會以活動與時間做為參考標準，本研究就此進行小幅修改，配合野草莓運動發展週期，將本研究中的網路潛水者定義為運動發生一個月內，大部份時間花在瀏覽網路相關資訊，但實際現身參與現場活動次數少於 3 次的參與者。

本研究基本假設參與社會運動的網路潛水者是對運動議題保持低度關心的「周邊參與者」。在尋找適合的研究對象過程中，本研究先行測試潛水者能否說出野草莓運動的三項訴求的大致內容，藉此初步排除只聽過運動名字，卻說不出其中任何議題內容的潛水者，之後才進一步了解其參與活動次數與時間，以確定適合的潛水者。

在行動者部份，本研究在 2010 年 2 月至 9 月時訪談 12 名曾經積極主動參與野草莓運動網路發聲與動員經驗的行動者，包括協助網路直播、架設分區網站、媒體組、發言人、全台聯絡人、協辦野莓開唱等活動，以及曾經加入北、中、南部現場決策小組的成員，以 W 做為受訪的野草莓行動者代稱開頭，並依其參與北、中、南部活動現場，分別以 N、M、S 代稱輔助說明地區脈絡，例如受訪者 WN1 或 WS1。至於潛水者部份，本研究在 2010 年 5 月至 8 月時訪談居住於北、中、南區，各 8 位、男女數量各半、30 歲以下、（當時）學生身份，共 24 位潛水者，受訪者則以 L 做為潛水者代稱開頭，同樣也以 N、M、S 代稱輔助說明其所在北、中、南區脈絡，例如受訪者 LN1-8、受訪者 LM1-8、受訪者 LS1-8。

二、個案背景

野草莓運動源起於 2008 年 11 月 3 日，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進行第二次江陳會，警政單位為避免重演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稍早訪台時爆發推擠衝突事件，遂以保護陳雲林人身安全為名，動用七千人次的警

力在其行經路線設置管制區，並對出入份子進行路檢、盤查、搜索、管束、物資扣留、驅離等，引起侵犯基本人權的爭議。

11 月 5 日，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首先於網路發難，在其 PTT2 個人看板及維基百科發表「1106 行動聲明」，聯合其他學校二十多名學者、學生共同發起靜坐運動，並透過 Twitter、MSN、PTT 及其分站的號召，逾 300 名大學生與教授於 11 月 6 日上午 11 時起在行政院門口靜坐，提出三項訴求：

1. 總統馬英九和行政院長劉兆玄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
2. 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下臺。
3. 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

由於當日靜坐抗議地點行政院為集會遊行法限定禁止申請集會之場所，遭到警方四度舉牌勒令解散，然而參與學生決議「不申請集會」許可，並主張這是一場「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希望透過對「集會遊行法」的衝撞、以突顯其荒謬性，決策小組表示，在集遊法規範下，警察的執法是「球員兼裁判」（孫窮理，2008 年 11 月 8 日）。

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於 11 月 7 日上午出面與學生對談，然因雙方溝通沒有交集，現場學生決定持續靜坐。警方於下午四時許，強制架離政院前靜坐約 400 名師生。晚間七時，原來在行政院前靜坐的群眾隨後轉往自由廣場繼續靜坐。後來現場有人利用筆記型電腦、無線網卡上網建立「野草莓運動」的主網站部落格，發表他們的論述與心聲。知名部落客也在自由廣場當場協助架設 Yahoo! Live 免費同步直播，讓網民能隨時在網路看到自由廣場的一舉一動。稍後幾天，現場學生開始用國台語、英語講解現場狀況，並徵求主播、即時口譯，以多種語言轉播活動現場。

11 月 9 日，自由廣場上的學生透過民主表決，將運動正式定名為「野草莓運動」，高呼「集遊法違憲，人權變不見」，呼籲所有公民挺身保衛自由與人權。繼台北的自由廣場靜坐行動後，野草莓風潮在各地

漫延。從 11 月 8 至 12 日，台南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校門口、台中市民廣場、新竹清華大學海報牆旁、高雄城市光廊、嘉義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陸續聚集各校學生以及群眾靜坐抗議，而各地現場也紛紛利用 Yahoo！Live 進行全台串流轉播。

全台各地參與野草莓運動學生、學界、民間團體代表號召在 11 月 15 於台北舉行千人大會師，可惜台北以外地區的學生僅派幾位代表北上參加，以致最後台北現場者僅一百多人參與。直到 11 月 23 日，野草莓運動為台灣人權辦告别式，在自由廣場搭建靈堂。

野草莓運動的訴求讓社會重新檢視集會遊行法問題，立法院遂召開修法公聽會，而行政院會也在 12 月 4 日通過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將現行的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五天前申請報備即可。不過，對於府院釋出的善意，野草莓運動並不領情，指行政院版本的集遊法修正草案實質仍是採「強制報備制」，與現行的「事前許可制」是換湯不換藥，玩弄文字遊戲（中央社，2008 年 12 月 7 日）。

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此時應做個結局，畢竟抗爭拖得愈久，只會模糊議題且浪費社會成本，該是轉換方式的時候了。」（徐佩君、陳怡靜，2008 年 12 月 5 日）。12 月 7 日，野草莓運動聯合台灣教授協會、全國教師協會、婦女新知協會等團體發起「1207 野給你看」遊行，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人權出殯」行動劇、「感恩晚會」等活動，終於結束歷時將近一個月的自由廣場的靜坐抗議活動，隨後野草莓運動轉往民間以其他形式繼續活動。

肆、資料分析

社會運動的運作，具備了三個基本原素，分別是資訊（information）、協調（coordination）、動員（mobilization）（McLeod & Hertog, 1999），尤其網路的出現，促進資訊傳播、形成公共空間、組織集體行

動，而實踐了民主化（吳國光，2003，頁 268）。野草莓運動經由網路串連而起，網路順勢成為野草莓運動行動者對外發聲與對內傳達資訊的傳播管道，進一步號召並動員群眾參與。本研究接著就網路在社會運動所發揮的資訊、溝通、動員功能，分析潛水者如何獲取野草莓運動的相關資訊，並與行動者進行意見溝通，以及現身參與動員行動。

一、資訊來源的自主權

傳統社會運動倚賴大眾媒體報導，強化了運動理念訴求與傳播效率，但運動理念卻容易被傾向保守的大眾媒體所稀釋、篩選與扭曲（鄭陸霖、林鶴玲，2001，頁 69）。野草莓運動行動者從一開始選擇網路做為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工具，期望藉此突破大眾媒體的防線而能掌握發聲的自主權，溝通效果也會從網路外延出去。行動者不可能忽視網路上溝通族群的潛在對象。潛水者得知野草莓運動的相關資訊來源，不外乎電視報導與網路，然而他們普遍不太信任電視報導，甚至直指媒體過度美化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受訪者 LS4 認為，「大眾媒體將報導集中在過分誇獎年輕人的自覺，以及他們非理性的街頭抗爭，應該報導他們的運動訴求才是。」

行動者不該輕易被主流大眾媒體規訓，尤其是電子媒體，如果有能力的話，更應該培養自己做媒體的能力（蕭新煌、顧忠華，2010，頁 179）。野草莓運動激出了年輕人「自己做媒體」的想法，但行動者如何與大眾媒體互動也很重要。野草莓運動行動者很快地利用網路建立起自己的正式發聲平台（官方部落格），可惜未能掌握資源闡述自身運動正當性，仍然依附在傳統大眾媒體資源，反而喪失了另類媒體主導議題的詮釋機會。受訪者 WN2 指出，「我們的訴求受到媒體和政治人物刻意誤導，只能將野草莓的訴求放在廢除集會遊行法上面，但刻意忽略政治人物應負的政治責任」。儘管野草莓運動有自己的部落格，能夠控制

資訊的出入，但是 WN2 坦承，「野草莓的聲音還是淹沒在大眾媒體裡面」。

受訪的潛水者幾乎都肯定網路發揮資訊快速傳遞功能，然而野草莓運動的官方部落格並沒有成為潛水者取得「官方」資訊的根據地，潛水者只是任意瀏覽散布在網路各處的野草莓運動相關資訊。受訪者 LS2 承認網路是運動可以自主發聲的管道，他說：「過去你要透過大眾媒體表達訴求，但是透過網路可以讓他人知道你的第一手消息，只是網路發展到現在，也跟大眾媒體一樣會分邊站。」即使網路是另類媒體發聲，也不可能沒有某種社會價值、意識形態隱含其中。

在 24 位受訪的潛水者中，僅 2 位提到偶爾會上野草莓運動官方部落格，其他大多數都是任意瀏覽而沒有上特定網站，他們對運動的關注力依賴的仍是電視新聞報導。然而隨著時間一久，他們不會主動持續關注，除非當電視新聞媒體再度報導時，才可能會引起他們的興趣。

除非野草莓有鬧得夠大的事，或者是剛好他們也正好跟我所關心的議題接近或甚至一致，否則我是不會特意主動關心，算是被動性的關心吧！只要野草莓又有把新的議題鬧得夠大的話，想不關心也不行，算是被動接受的！（受訪者 LN3）

推動社會運動所需要的資源，不只是有形的組織與物資，更需要一套新的認同與論述，也就是不同於以往的文化詮釋（Epstein, 1991）。曾經加入主播組的 WS1 提到，「現在大眾媒體只擷取他們想要的部分，就像某幾台斷章取義，刻意扭曲事實，因此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方式傳遞野草莓的訊息，即使只有少數人在觀看。」即使潛水者會在網路蒐尋資訊，目前他們獲取社會運動的相關資訊仍以大眾媒體做為主要消息來源，因此他們對運動的認知是依附在大眾媒體所設定好的框架（framing），矛盾的是他們並非充份信任大眾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網路真的能夠完全取而代之成為行動者發聲的主要平台？潛水者能藉此與行動者達到公共意見的溝通？資訊的再現形式也可能會影響到

潛水者的認知。

二、資訊再現的影像化

野草莓運動行動者除了建立官方部落格外，還首次利用網路直播技術，再現社會運動的活動現場，而各地現場陸續加入網路直播行列，形成全台串聯機制。透過網路影像播送，可以讓參與者之間立即知曉更多的訊息，以及了解現場決策情況，不論是北中南部的潛水者，初步都肯定網路突破物理限制，建構出不同的活動「現場」，並創造出許多溝通彈性的「空間」。例如，「北中南都有，可以交換訊息，了解彼此狀況」（受訪者 LN5）；「這種遍地開花的理念，可以把理念傳達出去」（受訪者 LS1）；「經由影像引起更多人的共鳴，了解更多的訊息」（受訪者 LM6）。

野草莓運動行動者當時實施審議式民主的創舉，無論大小決議幾乎都採用直接民主的現場決策，不管是行動計畫、訴求討論、日常生活運作，都一五一十地從現場麥克風傳出，尤其網路直播將決策運作透明化，企圖強化網民的現場參與感。其實，網路直播只是現場一名部落客「無心插柳柳成蔭」。

大家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就製造出一個有效管道出來……以前我們都覺得傳遞資訊好像是我們（部落客）的事情，但是我後來發現，大家都可以學起來（江偉華，2011）。

當時在媒體工作的 WN5 下班後過去現場觀看，習慣性會帶筆電、3G 網卡的他，只是要回報現場狀況，一開始也沒有轉播的想法，直到後來其他網友轉貼分享，很快地引起了上千網友關注。因為平日有工作，加上脫離參與學運的年紀，受訪者 WN5 自承比較像是外部協力者，單純提供技術上的幫忙，之後就把平台交接給學生。他說：「我想

媒體上看不到這些狀況，看報紙很容易被認為這是被操弄或別有政治目的，所以我想可能可以透過網路幫上一點忙。」原本同樣是技術協助操作網路，後來因為主播組人手不足而加入的 WS1 提到，剛開始情況不明朗，隨時都可能發生驅離的事件，所以採用 24 小時現場直播的方式，「不過現在這些影像也成為幾件官司的證據，所以同時可以蒐證」。

曾經擔任過野草莓發言人的 WN1 說：「網路直播是爲了要反制新聞媒體的扭曲，而且可以讓更多人可以進入決策參與。」一開始擔任中區發言人，後來成為全台串連聯絡人的 WM1 受訪時指出，網路的優點在於讓更多人關心這個議題，而 24 小時的網路直播，則是讓外界多一個管道了解野草莓運動，其中也得到很多對話，「不管是支持或是反對的聲音，至少了開啓另一個輿論的管道。」

儘管網路直播突破了訊息傳遞在時間與距離的限制，但全天候轉播未必是利多，反而造成訊息零碎化，而且也忽略了潛水者的替代式參與需求。潛水者因為無法親自到場參與，才會選擇時間彈性、參與自由的觀看方式。但是潛水者無法全天守候在網路上，卻因為加入觀看的時間點不同，無法臨時從前後脈絡中了解畫面透露出的訊息。潛水者不過是一時好奇心驅使下而觀看網路直播，他們無法從中途加入，而能理解野草莓運動理念與決策運作。

24 小時的時間過長，不夠明確，點進去的人可能也不清楚他們在作什麼，無法吸引想要更進一步了解野草莓訴求的人（受訪者 LN2）；

大家並不是 24 小時都守在那裡，看到的也許都只是表面的東西，無法看見真正的訴求和所表達的（受訪者 LM2）；

因為好奇看過，但是沒有什麼感覺，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在幹嗎？（受訪者 LN3）

野草莓運動網路直播現場畫面的同時，也開放線上聊天室討論，主播試圖介入轉述，形成線上／線下兩個現場對話。例如，當著名學者 Ronald Dworkin 於 11 月 20 日到達自由廣場時，自由廣場的主播說：

根據網友表示，他是紐約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名字叫做德沃金，那我們詢問處的同學有法律的背景，看到德沃金老師就非常地興奮，然後很開心然後很想要去請德沃金老師加入連署，但是那個德沃金老師就想要保持低調……（江偉華，2011）

不過，潛水者普遍對收看網路直播的觀眾抱持著質疑態度，「會來看的大部份都是有相同的看法，所以不需要溝通什麼」（受訪者 LS8），而且「這種比較極端的活動，會參加社會運動族群的餅就那麼大，並不會因為網路直播就讓參與人數增多」（受訪者 LN6）。網路直播只是提供同質性的參與者相互取暖的空間。

雖然野草莓運動的決策都是由現場的參與者共同討論表決後產生出來的結果，但是對大部份潛水者而言，網路直播只是單向式訊息傳遞現場決策，並不是一種有效溝通方式。受訪者 LN5 說：「網路直播還是比較單向的傳播，無法形成替代性參與，還是必須到現場實際參與才可以。」面對面發言，才是潛水者承認的雙向互動溝通，受訪者 LS7 說：「畢竟溝通是相互之間針對議題表示意見，而且相互對談才有效果。」不過他卻從沒有親自到場參與活動的經驗。

儘管網路直播現場同時開放網路意見討論，潛水者對此即時互動機制的反應幾近沈默，只是單純地想做個「觀眾」而已。曾到過台中現場 2 次的受訪者 LM4 表示自己是個低調的人，本來就不習慣網路發言討論，「我只是把它當成是新聞在看而已。」網路直播也發揮了監督現場的功能，偶爾會去高雄的中央公園活動現場，但沒有在那裡過夜的 LS2 受訪時說：「網路直播讓大家知道他們真的 24 小時都在那裡，證明有做到他們的承諾。」不過完全不會看到真正的一面，因為大家想看到還

是大眾媒體所想要報導的東西，她認為並不算有溝通。

網路只是野草莓運動的轉播站，行動者最終都希望任何參與者能到現場與他們溝通，受訪者 WN1 說：

我們接收訊息和傳送訊息的量過於龐大，光是現實中的平面和電子媒體、現場群眾的決議、跟政府內部的方向，我們就 OVERLOAD，在現場不管是人力或是器材也缺。

關於網路上的質問，野草莓運動行動者會有一組人專門去收集，只會做出總體的回應和聲明，卻無法一一回應個別網路使用者。WN1 補充：「我們無法看或知道他們（收看網路直播的人）在發表什麼意見。如果你有意見，最後還是要到現場來，把你的意見講出來。」受訪者 WS1 也指出，網路直播可以達到訊息迅速傳遞，但是還是無法取代現場參與的感覺。

網路直播技術的順暢與否，也會造成決策時不可預期的干擾。當初意外促成野草莓運動網路直播的受訪者 WN5 認為，直播對社會運動未必是加分，因為現場必須有足夠的人力與時間維持直播的運作，反而會加重現場參與者的負擔，尤其如果突然中斷，更容易引起網民不必要的猜測。

網路直播無法提供有意義的畫面素材，而潛水者對於運動存有既定的價值判斷，例如受訪者 LC8 說：「自己潛水好像也不算中立，只是我無法形成個人的意見。」網路直播只能提供潛水者片段式地理解社會運動的短暫機會而已，但潛水者卻從觀看／不觀看行為中，隱然產生我者／他者的心態。

三、運動理念的凝聚性

無論社會運動的目標為何，都得要經歷一個階段，亦即如何強化溝

通對象對運動訴求的認同，讓他們在彼此互動中產生共享的意義，激發出他們共同參與的意願，共同認定他們爭取的目標，從而劃分群體的外在邊界（何明修，2005，頁 76）。野草莓運動行動者運用網路做為對外發聲、對內聯繫的重要管道，如果內部缺乏共識的論述，很容易變成少數人的遊戲，影響潛水者對運動本身的認同，以及參與動員的意願。

社會運動行動者會策略性運用文化元素包裝重新詮釋社會問題，型塑出有利於集體動員的價值、觀點和論述（Benford & Snow, 2000）。幾乎所有受訪的行動者都提到參與運動都是基於人權的理由，認為集會遊行的言論自由受到打壓而站出來，強調要捍衛台灣的自由與人權。在野草莓運動官方部落格也以「野草莓運動—抗議行政濫權、總統院長道歉 集遊法違憲、人權變不見」做為部落格的名稱，主張這是一場「公民不服從」的運動。

大部份受訪的潛水者認為野草莓運動的理念一開始是很明確，尤其是集會遊行法修改這部份，不過對於要求官員道歉下台那部份，卻無法清楚理解，因為帶有某些政治色彩而被混淆是政黨鬥爭。受訪者 LS4 說：「修改集會遊行法的目的很好，值得大眾討論，只是其他是政治責任歸屬問題，其實有點疑惑運動理念以及方向。」

曾經參加過行政院前靜坐活動，後來沒有繼續轉往自由廣場參加的受訪者 LN1 提到，靜坐時剛好碰到民進黨圍城，結果回家看到媒體報導和現場情況有很大出入，讓人以為是民進黨發起，他說：「民視竟然將民進黨圍城的畫面和野草莓在行政院靜坐的畫面擺在一起……當時藍綠鬥爭的政治氛圍裡，野草莓的訴求和立場容易受到媒體的扭曲。」

野草莓運動行動者想要吸引主流媒體的注意，受訪者 WN1 說：「前期（約十天左右）每天都會提供新聞點，例如【野莓之聲】影片，但是後來沒有梗，能量變比較低，我們不求每天爆點，各地有各自活動。」不過主流媒體對運動立場的政治傾向，從來沒有停止質疑過，紀錄野草莓運動始末的【廣場】（2011）一片的導演江偉華表示，野草莓

運動的困境在於太在意外界的觀感、太在乎媒體的報導，導致運動能量停滯不前（楊宗興，2011 年 11 月 1 日）。

可惜的是野草莓運動行動者也沒有利用網路說得更清楚，各地現場只剩下未被主流大眾媒體關注到的零星戰火。曾為高雄場決策小組一員的受訪者 WS3 指出，不管是在媒體聯繫、操作動員、訊息分享上，台北仍舊是中心，但是它無法直接操控其他各地方，例如主播組多是獨立部落客，各自利用不同的管道傳遞野草莓的訊息，而北中南的轉播都是各自獨立運作，各地到後來幾乎各自為政。在高雄一場關於野草莓運動的座談會上，部份與會者就現場觀察經驗指出，網路現場轉播的有無，當然能影響運動的宣傳速度與範圍，但並不能改變網路使用者對運動訴求的認同與否（曾巧儀，2008）。誠如 WN5 受訪時強調：「直播不能變成主體，不然很容易模糊焦點。」他希望觀者能夠親自到現場去了解運動訴求。

各地潛水者憶起當時情景，對於野草莓運動的後來論述、提出時機、操作手段等可能沾染政黨色彩，一直有疑慮，而影響了他們當時積極主動參與的意願。受訪者 LN1 擔心若是自己涉入太深，「很容易被外界簡單歸納成和這些人是同一夥的。」；受訪者 LM3 說：「當時的政治氛圍的關係，很容易被人家認為你是綠色的。」受訪者 LS3 也說：「政黨的影子太強烈，我實在無法相信這個運動是『單純』的學生運動。」

野草莓運動的訴求受到各地不同社會氛圍的影響，光是南北兩地的行動者主打的議題就不同，受訪者 WS3 指出，北部大多是關心人權議題的 NGO 成員，而高雄場的活動主軸則偏重「打馬」，他並不否認與當地綠營的氣氛較重有關，為和市民拉近距離，而「打馬」是較好操作的議題；然而台北場的活動為了避免政治色彩介入，不接受政黨的物資人力支援，可能因此讓人產生野草莓排除更大規模參與的印象。對於潛水者來說，運動的力量始終沒有真正凝聚，受訪者 LM6 說：「各地都

有靜坐人群，畢竟分散的感覺是不集中，而且很多人無法了解運動的目的。」

潛水者除了擔心被簡化歸類為特定政黨支持者以外，後來也質疑起這場運動的時代意義，甚至思考自己的主體性。受訪者 LS2 提到網路直播觀看高雄場經驗，他說：「這邊是有人把它弄得像廣播一樣，一直在講以前的事情」，而他也回憶道親自到台南場（成大）活動現場經驗，卻有種時空錯置的錯愕感。

有一次我去看，當天晚上在放李文忠事件，感覺滿怪的，好像要營造一個我們被迫害的感覺，可是野草莓應該是我們主動發起的訴求，而不是被某某人迫害所造成……現在回頭看，感覺好像是被某些大人拖著走的感覺，也不太像是我們這世代的學運。（受訪者 LS2）

台北場聚集了主流媒體最多關注的「異樣眼光」，尤其是 11 月 30 日野莓開唱的表演樂團「表兒」在現場批評總統馬英九是 gay、娘砲的言論，讓不少潛水者更加困惑。受訪者 LN6 指出，表兒樂團同志歧視事件將性別議題帶入這個運動，同時也混淆了大家對這個活動的視聽，促使更多漠不關心的大眾把這個運動當作「猴戲」看待。受訪者 LN8 坦承自己一開始對這個運動沒太多關注，「再加上居然搞到人身攻擊上了，所以就覺得這種運動沒有要再花時間看下去的必要。」當初協助舉辦野莓開唱的受訪者 WN4 表示，尊重表兒的表演是他們的抗議方式，但當初他自己覺得並沒有必要辦表演，直言「只是『熱鬧』而已，因為到後來人已經越來越少，他們（野草莓運動）只是在找一個退場機制而已。」

四、動員網絡的關係結構

這一代年輕人是伴隨著網路成長，無論是行動者或潛水者都體認到

網路是現今社會運動的有效動員工具，誠如受訪者 LS6 所說：「我們不可能放著如此好用的工具不用，而去回到野百合時代。」野草莓運動中網路直播首度展現出的動員力量，成為參與者的共同歷史記憶，一篇文章描繪了運動首日傍晚的現場情況。

警方突然強勢驅離學生，於是學生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即時地傳送了出去，因而在不到 2 小時之內，超過原本聚集在行政院前人數數倍之多，頓時湧進了自由廣場，各方物資更是頃刻大舉湧入，已不是現場呼籲停止的廣播可以控制的（謝昇佑，2009，頁 284）。

野草莓運動始於一篇對特定偶發的政治事件所表達不滿的網路文章，接著不斷地被轉貼流傳，進而號召其他人共同加入。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一開始多因認同文章而來，既沒有核心組織，參與群眾也不固定，彼此更不見得相識。然而他們多半抱持網路快閃行動的心態，一開始並沒有長期抗戰的準備，根本難以掌握參與者的行蹤（蕭新煌、顧忠華，2010，頁 174）。所謂「動員」狀況，並非原先發起人所能估量，參與與否依賴於讀者自己的選擇，至於後續的動員，更加難以掌握（許容禎，2009，頁 296）。

網路提供現代人參與社會運動的一種替代性管道，參與者的隱匿在網路社會運動更為明顯。潛水者的參與動機反映出原子化的個人選擇，他們多數選擇在家上網任意瀏覽相關資訊，頂多偶而看看網路直播，認為「只要在家上網關心就好」。若到現場參與活動多半是出於同學朋友關係，不然就只是偶然因素，而且待在現場的時間通常很短。受訪者 LN3 坦承，「除非有朋友過去靜坐，才會過去陪陪他」。受訪者 LS7 則是因為「上學經過校門口時，才會看一下他們有什麼活動。」大部份潛水者都是初次參與社會運動，平日會關心時事，不過卻很少與人公開討論。

潛水者會因個人不同考量而不想持續或固定參與現場活動，例如期中考週、平日要上課、聚集地距離遠、年紀漸長等。

畢竟我們還是學生嘛，這樣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影響比較小，也比較符合現代的需求，畢竟我們不可能連續一、二個月，放著手邊的工作不作，考試不考，書不念，在那邊一直靜坐。（受訪者 LS3）

潛水者的偶發式參與現場動機，加上參與時間不固定，讓他們得以保有高度彈性的「不現身參與」自由。即使潛水者是因為恰好認識其中行動者而前去，卻沒有誘發他們持續參與，也有因為原來認識的行動者退出轉化成潛水者，致使足以帶領他們至現場的連帶關係中斷。

表面上，潛水者似乎因為個人考量而不願意參與現場活動，但其實是潛水者認為經由網路動員只能找到特定族群，並不認同自己屬於其中特定有共識族群的一員。受訪者 LM2 說：「野草莓運動的開始是因為看到熟人的轉貼文章，所以他們才決定去靜坐，也就是說這些資訊是在特定有共識的人之間流傳。」受訪者 LS8 說：「參與的人永遠就那些，雖然各校都有，但還是小貓兩三隻，真正敢站出來的學生不多。」

中部的受訪者 LM8 曾經是個積極參與的行動者，但後來退出成為若即若離的潛水者。運動一開始，LM8 即北上前往行政院前靜坐，後來在台中也擔任共同發起人。他說：

兩個禮拜之後，因為很累，加上學校給予一些壓力……在野草莓北中南大遊行之前，因為個人因素而離開了。之後還是會關心野草莓動態，多少會過去現場看一看。

經由網路創造虛擬空間的社會運動，無論是線上或線下的參與流動性都很高。野草莓運動參與者彼此之間的聯繫關係很弱，連行動者在現場參與時間都不固定。受訪者 WN1 表示，網路傳遞的訊息很廣，但是人和人之間的連帶關係很弱，網路只適合傳播訊息和募款而已，並不適

合動員之用。過去社會運動者透過現場靜坐以凝聚人氣，但是野草莓運動則是輪班制（白天人很少，晚上人比較多），實際參與者很難固定下來。受訪者 WN6 說：「現場聚集的人群流動率很高，常常同一個議題決策在這個時段通過，但下個時段可能就被另一批人推翻。」受訪者 WN2 形容得貼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每個人都有權力，但是卻沒有責任。」

在野草莓運動現場，無論大小決議採用「直接民主」的現場決策，到了晚期卻淪為參與者與幹部意見不一致的「流水席式民主」（蕭新煌、顧忠華，2010，頁 179），而且這種形式「終究無法處理學生白天人數遞減，晚上才來開會的窘境」（何東洪，2009，頁 124）。野草莓運動透過網路大量動員而來的群眾，大部份都沒有社會運動經驗，就算少數有經驗的行動者也無法主導現場討論，「原本的立意是希望決策方式能夠實踐民主，但是去中心卻落入各說各話、多頭馬車的困境」（受訪者 WN3），終至形成 Freeman（1973）所謂「缺乏結構的暴虐」（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野草莓運動現場的參與群眾的行蹤都不定，而且現場參與者還曾經主張「離開這個廣場，沒有人可以宣稱他是野草莓學運代表」（江偉華，2011），若再加上網路替代式參與的潛水者，即使是從既存的人際關係動員而來，彼此關係網絡也難以維繫，因此結構化的動員網絡難以成形。

五、運動網絡的動員行動

如果只試圖證明動員網絡的存在是不夠，真正的挑戰在於網絡所能產生的作用（何明修，2005，頁 107；Passey, 2003）。運動網絡除了發揮溝通的功能外，還要透過聚眾行動而促成網絡的團結。網路動員具有高度的工具性，固然有助於跨群體的資訊流動，但是在強化群體內部的凝聚力時所需要的情感投入，對於行動者而言卻面臨了很大的挑戰。受

訪的行動者幾乎一致認為動員支持者到現場參與才是最實際的行動，除了向社會大眾發聲外，也透過現身所展現出的集體意志的力量，讓抗議對象造成壓力。儘管網路可以有效傳播訊息，受訪者 WM1 指出，「但壞處就是有些人會選擇坐在家裡關心，而不到場關心。」然而對於潛水者而言，他們的行動是種遠距的情感聲援，特別是在動員初期時，給予現場衝鋒陷陣的行動者的社會支持。

因為我們跟野百合世代不一樣，沒有相同的背景，現在的學生也不會有那麼強烈的動機，但透過網路的串聯，那些在大太陽下帶頭衝的，可以感受到支持，他們也可以在最必要，最須要人力來凝聚力量，對政府形成壓力的時候，透過網路號召，讓鄉民（或是學生）在特定時段內到達現場。（受訪者 LS1）

極少數的潛水者曾經在運動之初會在網路串連，不過並不會加入現場動員行列。受訪者 LS6 曾經和朋友小額集資捐款給野草莓運動，而受訪者 LM5 則會在網路上精神喊話，「在我的網誌或是 MSN 狀態表示對他們的支持或是看法。」不過潛水者的聲援是網路上分散式的個人選擇，集體特性不強，並沒有相稱地反映在現場動員經驗而產生團結作用。

在少數曾經參與過現場活動的潛水者中，他們的經驗幾乎僅只於靜坐一項活動而已，無論外在誘因如何強烈，大部份潛水者還是不受影響，依舊維持靜態、觀看式的網路活動（例如網路新聞等），甚至連參與網路公共論壇的討論，都抱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

雖然說好像可以很自由地發表言論，不過 PTT 其實是個很殘忍的地方，要出來 PO 文的其實都需要很大的勇氣，被噓、被人肉之類的，有一點主流暴力。如果是在現場的，很忙很累的時候還要跟別人在 b 上打筆戰，除了妖西系列的很少人可以做到吧。（受訪者 LM8）

現場參與者在不同時間點、不同形式加入野草莓運動形成意見不一致現象，加上了網路參與的隱匿性，很容易限制了現場動員的能量。

【廣場】（江偉華，2011）描述當運動進入 10 天後，現場人數明顯減少，現場同學開始討論各種動員方法，包括校園召募、蓋活動式碉堡等，但後來他們則爭執組織由誰主導、民眾捐款如何處理、如何退場結束等問題。野草莓運動現場參與者根本無法討論運動訴求的深化，只能藉著活動的編排而被快速瀏覽運動的面貌（何東洪，2009，頁 125）。

儘管大部份潛水者都認同社會運動的網路動員形態與實體現場參與氛圍不同，承認親身接觸才可以達到溝通效果，但最後現身參與活動的意願非常低，潛水者對動員的認知與行動近乎分離。潛水者之所以不想被動員，除了自承沒有長期參與靜坐，也沒有持續關注這個議題，只能仰賴觀看網路轉載或是大眾媒體報導得知野草莓運動，但這些運動訊息不是趨向零碎化，不然就是習於呈現扭曲或稀釋的觀點，以致潛水者難以一窺運動全貌，或是對運動現場的參與者的觀感不佳。受訪者 LM4 說：「在 PPT 上看到有網友因為看台北現場直播的關係，覺得來參與的學生都在把妹，浪費民眾捐贈的物資。」潛水者不只心態上拒絕被歸屬於任何特定有共識族群，更不想因為現身而被標籤化。

因此，重點並不是客觀情境的改變，而是觀看情境的態度改變。正如受訪者 LS3 說：「我們每天都幾乎要經過那個校門口，會看到野草莓靜坐的場子，但大多保持靜觀與冷漠的態度。」其實，潛水者並不是單純個人私利考量而不現身，而是擔心被污名化，以致他們寧可自我選擇他者化。

伍、討論與結論

網路本身就是一場貌真實似虛擬的社會運動，不單承載著社會運動的動員能量，也是權力競逐的場域。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存在高度的多

變性，而網路的技術特性也會造成傳統社會運動分析概念的不穩定，因此社會運動參與者圖像也呈現多樣性。本研究不同於社會運動主體的行動者觀點，改從網路潛水者的角度切入，以「野草莓運動」為個案，就網路在社會運動所發揮的資訊、溝通、動員功能，描繪出國內的網路潛水者參與社會運動時的樣貌，同時透過行動者與潛水者各自詮釋與反思觀點，指出潛水者在公民參與實踐時所產生的「民主落差」。

本研究發現，儘管網路是社會運動行動者可供運用的新式資源，他們卻誇大工具理性，而忽略潛水者對運動理念的疏離感。McAdam（1999）指出，社會運動可以透過自主的溝通網絡，個體比較容易接受外來的訊息，而有理解改變現狀的可能。從資訊來源的自主權來看，野草莓運動行動者試圖利用網路資源建立自己的發聲媒體，然而潛水者對於運動的消息來源與認知圖像，仍然依附在傳統大眾媒體的詮釋下。

野草莓運動行動者將運動資訊影像化，藉由網路直播提供潛水者替代式參與的動員行動誘因。網路的工具性有助於訊息的傳遞，卻不利於建立集體認同（Diani, 2000）。對於潛水者而言，網路直播只是單向式傳遞現場已經做好的決策，而且訊息趨向零碎化，不只未能符合他們的參與需求，無法形成遠距／現場、線上／線下參與者的公共對話，只成為少數行動者相互取暖、相互慰藉的注視空間。因此，網路技術串連而出的運動網絡，不僅沒有達成解放潛水者對運動的認知誘因（McAdam, 1999），也分化潛水者、行動者之間可能產生的團結誘因（Hirschman, 2002）。

我群化的集體認同並不是單純依恃網路技術就足以克服，而是應回歸到運動本身能否開展更加完整全面的論述，不只提供原來支持者持續投入的理由，還要能使局外人、旁觀者產生心理認同，進而維繫社會運動的正當性，以期獲得社會大眾對議題的重視與支持。在野草莓運動中，行動者之一的受訪者 WN1 坦承：「大家擁有熱情，但會在活動中被磨損掉，因為我們沒有做到思想應有的高度。」。台北活動現場的其

他參與者也省思，野草莓運動深化論述能力不足，說明了本身思想準備不夠，而且缺乏良好的組織化，再加上參與者彼此信任不足等因素（許容禎，2009；謝昇佑，2009）。於是，在「先天不足、就地練功」的情況下（何東洪，2009），箝制了運動訴求的深化、決策以及後續動員能量。對於潛水者而言，他們一開始曾經認同野草莓運動部份理念，但揮之不去的政黨色彩，影響了他們積極主動參與的意願。潛水者不信任電視新聞報導，但網路直播也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只能自行拼湊出想像中的野草莓運動理念圖像。

本研究還發現，潛水者的偶發式參與動機反映出原子化的個人選擇，缺乏結構化的聯繫網絡，無法創造出運動現場的臨場參與感。人際網絡是激發社會運動參與的重要動力（何明修，2005；Della Porta & Diani, 2006）。野草莓運動藉由網路串連的兩個「現場」，參與者之間的人際關係都是疏離。野草莓運動透過網路大量動員而來的群眾，在現場參與行蹤不定，而在現場直接民主的決策機制下，只要現身、只要發言，就有權力隨時可以推翻上一秒別人做好的決定，卻不必負責任，意外地突顯現場參與者彼此間信任關係淡薄；而網路替代式參與的潛水者，即使偶發式參與現場動機被誘發，或藉由既存人際網絡動員移轉至現場參與，然而一旦既存人際網絡的行動者退出，卻可能難以與現場參與者繼續維繫人際網絡。

儘管在動員初期潛水者願意提供遠距的社會支持，但是潛水者的集體認同不足，而現場後續活動設計與網路技術，只是加深他們對運動的疏離感。Hirschman（2002）主張，如果能轉化公共參與成爲一種樂趣，搭便車就不再是問題。在野草莓運動中，潛水者的參與是種享受初期注視的樂趣，他們會在好奇心驅使下，藉由網路技術去觀看運動現場的參與氛圍，他們只願意在初期提供遠距的情感聲援，很少有靜坐現場以外的其他動員想像。

社會運動的參與是個持續性的賽局，參與者在不同的時間點上會不

斷地面對離去，或是繼續參與的抉擇（范雲，2003，頁 157），時間因素決定了潛水者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距離。在野草莓運動中，潛水者不會持續關注相關議題，而且也沒有全程參與現場活動，只能仰賴觀看零碎化、片段式的網路訊息，或是大眾媒體的扭曲或稀釋的慣性報導觀點，使得他們不易一窺運動全貌，而且對運動現場的參與者的觀感不佳，強化了他們在社會運動中隱晦的他者心態。野草莓運動並非如 Olson（1965）所稱社會運動的參與是「一次決定」（one-shot）的賽局，但潛水者浮光掠影地「瀏覽」社會運動，並將持續觀看與否的行為化約成我者／他者的心態，後來潛水者不只拒絕被歸屬於任何特定有共識族群，更不想因為現身被標籤化，以致他們寧可自我選擇他者化。

社會運動於網路上呈顯的力道，已經不是單純誰使用網路與否的問題。鄭陸霖與林鶴玲（2001）曾經擔憂隱匿的參與者會造成搭便車，而有癱瘓集體行動的可能。在野草莓運動中，如何整合不同參與者的運動想像，劃定參與者的界線、穩定決策機制、澄清各路來者的目的，浮現出的是權力結構困境（謝昇佑，2009，頁 283-287）。究竟潛水者是要被劃分在參與者的界線之內還是之外？行動者或許還沒答案，但是潛水者悄悄地做出了選擇，於是他們選擇與自我麻痺的他者，漸行漸遠。本研究最後指出，潛水者並非想要搭便車，但是他們對社會運動理念的陌生疏離感未能被消弭，伴隨網路技術而來的逃避空間，挑起了他們對運動隱藏的他者神經，可能會使得社會運動參與者之間的民主落差愈形擴大。

面對潛水者參與社會運動經驗，本研究並非對潛水者抱持著全然悲觀的看法，畢竟他們也曾經認同並參與運動現場，只是在傳統社會運動理論及實作經驗所需的親身接觸與現實集體空間性，展現了另類的資訊傳遞、溝通與動員方式。

過去許多研究指出，網路使用、政治參與、社會資產具有正面的連帶關係，以「資訊搜尋」為上網動機，可以增進個人生活滿意程度、人

際關係信任程度及公民參與程度（Delli Carpini, 2000; Shah, McLeod, & Yoon, 2001）。以國內情形而言，以「資訊搜尋」為動機有助於政治資訊搜尋或社會資產，而「人際互動」動機則可以有效地預測網路「政治意見交換」與「政治意見表達」（張卿卿，2006）。潛水者只瀏覽資訊不發言的網路使用行為未必是件壞事，而關心社會運動的潛水者正是目標族群（target audience），如果能夠善加利用他們的溝通特性，配合科技特性與人際網絡的連結，反而可以提供潛水者適當的認知誘因，進一步促進團結誘因。

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社會運動可以考量潛水者的使用習性，發展出以「政治資訊搜尋」功能為主體的整合性平台，強化他們對運動理念的理解，同時結合傳統人際網絡與網路技術特性，例如社交媒體（social media），讓他們從日常人際互動而產生滾雪球動員力量，發展出專屬於網路潛水者的另類政治參與模式。

至於在研究限制部份，本研究一開始在潛水者的操作定義上，除了配合他們網路活動習性，還加入他們現身參與次數，做為參考標準。然而現場參與活動的次數該如何定義才合理，是否每次都得因應不同個案或不同社會運動發展的週期而調整次數去設計，不只是本研究限制，也建議後續者可思索發展出「標準定義」的一體適用性。

儘管本研究發現人際網絡在動員潛水者具有部份成效，可惜未能訪問到他們平日線下參與其他公共事務活動，以及了解到他們其他的人際網絡連結情形，多少限制了本研究推敲潛水者的公民參與動機與實踐之間的關係，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就此做更完整的考察。

本研究在探詢野草莓運動行動者受訪意願的接觸過程中，發現部份行動者的退卻傾向，限制了本研究在呈現行動者意見時的周延程度。本研究依循相關媒體報導中去找尋當時活躍於野草莓運動現場活動的幾個行動者，後來他們卻「謙稱」自己當時只是潛水者，自認涉入並不深，因為不是全程參與，僅在某段時間出過力而已，甚至後來已經完全不在

意任何相關活動，更無意再談起那段經歷，不是直接拒訪或是輕描淡寫。另外，當時各地現場決策運作情況不盡相同，運動期間也歷經多次改組，而本研究錯失時間點尋找受訪者，不只當時許多行動者已經無從聯繫起，甚至時空轉變而忘了當時細節，或因目前現實考量（例如正在當兵）而不方便多說。

然而，本研究尋找受訪者過程中遭逢的困難，卻點出了個體生命歷程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野草莓運動中，那些原來活躍參與之後又離去的「退用者」（dropouts），只是單純的熱情無以為繼，抑或喪失認同而選擇退守成為旁觀的潛水者？社會運動是許多個體的集合，不同參與者的養成背景、成長環境、時代氛圍等個體生命史特徵，可能促成運動的產生，也可能造成內部鬥爭（何明修，2005，頁 89）。在變動的歷史與個人生命傳記的交會中，個人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會改造自我，甚至影響了他們後來的生命選擇與公民參與持續性（范雲，2003）。因此，除了潛水者對運動認同轉變是深具探索的空間外，不同世代的潛水者是否會因此產生特定政治觀點，或改變他們後續的公民參與行動以及生命歷程發展等議題，未來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參考資料

- 中央社（2008 年 12 月 7 日）。「野草莓靜坐一個月 明起漸退場」，《聯合報》，2008 年 12 月 7 日。
- 江偉華（導演）（2011）。廣場【影片】。（同喜文化出版工作室，台北市大同區興城街 10 巷 16 號 2 樓）。
- 何明修（2005）。《社會運動概論》。台北：三民。
- 何東洪（2009）。〈我的台北「野草莓」雜記〉，《思想》，11: 119-132。
- 李明穎（2008 年 9 月）。〈網路潛水之民主意涵探討〉，「2008 年傳播與科技研討會」，新竹。
- 李郁薇（2005）。《網路學習社群中的潛水現象：一種被忽略的充份參與》。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郁薇、陳斐卿、江火明（2006）。〈社群觀點的網路潛水現象：認同與協商的構程〉，《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報》，4(1): 1-9。
- 吳筱玫（2003）。《網路傳播概論》。台北：智勝文化。
- 吳國光（2003）。〈資訊傳播、公共空間與集體行動：試論互聯網對中國民主化的政治作用〉，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 263-280。台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 林鶴玲、鄭陸霖（2001）。〈台灣社會運動網路經驗初探：一個探索性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5: 111-156。
- 周祝瑛（2008 年 11 月 13 日）。〈向奮起的宅男宅女致敬〉，《蘋果日報》，論壇版。
- 陳順孝（2008 年 11 月 26 日）。〈網路作為社會運動基礎建設：以野草莓運動為例〉，「輔仁大學演講」，台北。
- 范雲（2003）。〈連結運動者與變動的政治機會結構：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個案研究〉，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 137-173。台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 徐佩君、陳怡靜（2008 年 12 月 5 日）。〈「集遊法」改報備 野草莓決撤離〉，《蘋果日報》。
- 許容禎（2009）。〈開放社運的想像〉，《思想》，12: 295-302。
- 曾巧儀（2008）。〈當科技的工具力量被過度詮釋〉，《噉》。上網日期 2009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au-mag.org.tw/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12-2008-11-02-08-23-39/44-2008-12-27-05-35-27>
- 黃哲斌、何榮幸、高有智、郭石城（2008 年 11 月 21 日）。「按 Enter 我抗議 網路社運我來了」，中時部落格新聞。上網日期 2009 年 4 月 12 日，取自 <http://blog.chinatimes.com/blognews/archive/2008/11/21/351469.html>
- 張卿卿（2006）。〈網路的功與過：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及社會資產關係的探討〉，《新聞學研究》，86: 45-90。
- 孫窮理（2008 年 11 月 8 日）。〈自由廣場再集結 學生決議不申請集會遊行〉，《苦勞網》。上網日期 2009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cooloud.org.tw/node/29651>
- 楊宗興（2011 年 11 月 1 日）。〈紀錄片《廣場》重現野草莓學運〉，《新頭殼》。上網日期：2012 年 3 月 20 日，取自 <http://n.yam.com/newtalk/garden/201111/20111101972414.html>
- 蔡鴻濱（2006）。〈網路社會運動之語藝分析：以苦勞網中「香港反 WTO」事件為例〉，《傳播與管理》，6(1): 1-48。
- 謝昇佑（2009）。〈偶然還是必然？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思想》，12: 281-302。
- 陶儀芬（2008 年 11 月 11 日）。〈珍惜學運民主資產〉，《蘋果日報》，論壇版。

- 鄭陸霖、林鶴玲（2001）。〈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上的展現：台灣社會運動網站的聯網分析〉，《台灣社會學》，2: 55-96。
- 蕭新煌、顧忠華（編）（2010）。《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台北：巨流。
-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udge, I. (1996). *The new challenge of direct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nett, G. (2000).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 typology. *Information Research*, 5(4). Retrieved from <http://informationr.net/ir/5-4/paper82.html>
- Castells, M. (2004).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UK: Blackwell.
- Correll, S. (1995). The ethnography of an electronic bar: the lesbian café.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3), 270-290.
- Delli Carpini, M. (2000). Gen.com: Youth,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341-349.
- Della Porta, D. & Diani, M.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 Diani, M. (2000).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virtual and re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3(3), 386-401.
- Downing, J.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Epstein, B. (1991). *Political protest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iedman, D. & McAdam, D.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 Networks, choice 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A. D. Morris, & C. M. Mu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pp. 156-173).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J. (1973). The origins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792-811.
- Grossman, L. K. (1995).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Reshaping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NY: Viking.
- Hirschman, A. O. (200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 Zeitner, V. (2003). Internet use and civic engagemen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7, 331-334.
- Katz, J. (1998). *Luring the lurkers*. Retrieved from <http://slashdot.org/features/98/12/28/1745252.shtml>
- Kling, R. (Ed.). (1996). *Computerization and controversy: Value conflicts and social choices*. San Diego, C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 Kollock, P., & Smith, M. (1996). Managing the virtual comm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omputer communities. In S. Herring (Ed.), *Computer-mediated*

-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 soci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09-128). Amsterdam, NL: John Benjamins.
- Lindlof, T. R. & Shatzer, M. J. (1998). Media ethnography in virtual space: Strategies,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42, 170-186.
- McAdam, D. (1999).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 & Paulsen, R. (1997).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In D. McAdam & D. A. Snow (Eds.),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pp. 145-157). Los Angeles, CA: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 McLeod, D. M. & Hertog, J. K. (1999). Social control and the mass media's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protest groups: The communicative acts perspective. In D. Demers & K. Viswanath (Eds.), *Mass media,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hange* (pp. 305-330).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ele, C. (1999). Cyberspace disadvantages communities: The Internet as a tool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M. A. Smith & P. Kollock (Eds.),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London, UK: Routledge.
- Melucci, A. (1995).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 Johnston & B. Kla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elucci, A.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ler, E. N. & Opp, K.-D. (1986). 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71-488.
- Myers, D. J. (1994).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movement: contributions of computer networks to activism.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2(2), 256-260.
- Nielsen, J. (2006). Participation inequality: Encouraging more users to contribute. Jakob Nielsen's Alertbox, October 9, 2006. Retrieved from http://www.useit.com/alertbox/participation_inequality.html
- Nip, J. Y. M. (2004). The queer sisters and its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A study of the Internet for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W. van de Donk, B. Loader, P. Nixon & D. Rucht (Eds.), *Cyberprotest: New media, citizens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UK: Routledge.
- Nonnecke, B. (2000). *Lurking in email-based discussion lis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London.
- Nonnecke, B., & Preece, J. (2001, August). *Why lurkers lur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Boston, MA.
- Norris, P. (2001).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iver, P. (1984). If you don't do it, nobody else will: Active and token contribution to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601-610.
- Olson, M. J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ssey, F. (2003). Social networks matter. But how?, In M. Diani & D.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pp. 21-4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eece, J., Nonnecke, B. & Andrews, D. (2004). The top five reasons for lurking: Improving community experiences for everyon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 201-223.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Rogers, E. M. (2001). The digital divide. *Convergence*, 7, 96-111.
- Salter, L. (2003). Democracy, new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Internet: A Habermasian analysis. In M. McCaughey & M. D. Ayers (Eds.),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17-144). London, UK: Routledge.
- Shah, D. V., McLeod, J. M., & Yoon, S. (2001). Communication, context, and community: An exploration of print, broadcast, and internet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464-506.
- Smith, M. (1992). Voices from the WELL: The logic of the virtual commons. Retrieved from <http://www.sscnet.ucla.edu/soc/csoc/papers/voices/Voices.htm>
- Smith, M., & Kollock, P. (1999).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London, UK: Routledge.
- Spaeth, S., Haefliger, S., von Krogh, G. and Renzl, B. (2008). Communal resources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Research*, 13, 1, paper332. Retrieved from <http://InformationR.net/ir/13-1/paper332.html>
- Turner, R. H. & Killian, L. M.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Verba, S., Scholzman, K. L., & Brady, H. (Eds).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 Donk, W., Loader, B. D., Nixon, P. G. & Rucht, D. (Eds.). (2004). *Cyberprotest: New media, citizens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UK: Routledge.
- von Krogh, G., Spaeth, S., & Lakhani, K. (2003). Community, joining and specialization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Research Policy*, 32(7), 1217-1241.
- Warkentin, C. (2001).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NGOs,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Lanham, M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Zhang, W. & Storck, J. (2001). Peripheral members in online communities. Proceedings of AMCIS 2001. Retrieved from <http://opensource.mit.edu/papers/zhang.pdf>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civic participation of Internet lurkers: A case study of the “Wild Strawberries Movement”

Ming-Ying Lee*

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a new tool for resource mobilization for social activists. However, digital divide may restrict the power of social movements on the Interne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map the participation of lurkers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analyze the potentials and restrictions of their civic participation by using the “Wild Strawberries Movement” in 2008, which opened a new leaf of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as a case study.

Through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social activists exaggerated the instrument reasons of the Internet. However, the apathy of lurkers toward social movements was neglected. Internet technology did not liberate the lurkers’ cognition. Solidarity between activists and lurkers was also split. The lurkers thus refused to belong to any specific group with consensus. Moreover, they had no intention of physically participating in organized protests. They were afraid of being labeled, which affect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fter being disappointed, the lurkers’ sensation of “others” was reinforced.

Keywords: civic participation, Internet, lurkers, social movements, Wild Strawberry Movement

* Ming-Ying Lee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